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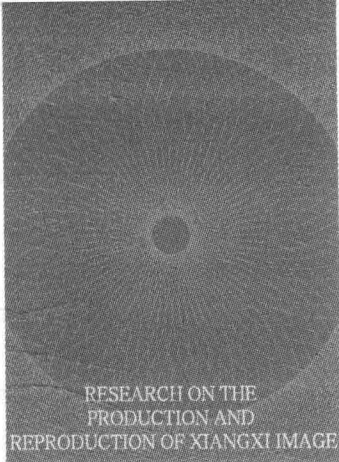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XIANGXI IMAGE

湘西形象的生产与 再生产研究

胡显斌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XIANGXI IMAGE

湘西形象的生产与 再生产研究

胡显斌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西形象的生产与再生产研究/胡显斌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096-4672-4

I. ①湘… II. ①胡… III. ①文化史—研究—湘西地区 IV. ①K2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5623 号

组稿编辑: 张永美
责任编辑: 王格格
责任印制: 司东翔
责任校对: 雨 千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16
印 张: 21.5
字 数: 39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4672-4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序

真挚情怀 恢宏视野

胡显斌博士是土家族人，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长，到千里之外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求学，攻读的是戏剧与影视学。他对形象学特别感兴趣，毕业后从事人文课程教学。所有这一切因缘，在这部厚重的著作里都得到了反映。读者既可以从中发现显斌对家乡深厚的感情，又可以发现厦门大学求学经历对他的深刻影响（例如，他深为我校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所吸引），还可以发现书中举了不少和“文学湘西”、“影像湘西”、“表演湘西”相关的例子，经常从“人”的角度加以阐释。

尽管如此，缘由归缘由，经历归经历，学术研究本身却是深入思考的过程。本书的前身是显斌的博士论文。选题之始，他就不断探索自己的学术定位，从土家族的文化遗产，一直到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当他几经比较，终于选定“湘西形象的生产与再生产研究”这个题目之后，就毅然决然地投入研究之中。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所提交的成果显示了他相当开阔的眼界：重点虽然在当前，但意脉接连上下数千年；目光虽然紧盯湘西，但视线扫过世界各大洲。

我们既可以用本书印证自己关于湘西的印象，又可以从中发现显斌的“自画像”。他从湘西走来，又回到湘西。在世界风云变幻的今天，显斌从国家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中看到“边的机遇”，在家乡社会生活的变迁中瞩目“蛮的转型”，在“巫的升华”中寻找美美与共的湘西本位。这些学术探索和我对他个人的美好印象叠加，构成了“作者形象的生产与再生产”。作为一种过程，上述生产与再生产并不会由于本书的出版就终止，而是将随着显斌本人的努力而谱写新篇章。

显斌刚传来博士论文初稿电子版时，我浏览之余的心情是欣慰、欣喜。显斌告知本书即将出版时，我再度体验到了上述心情。我自己近20年来主要从事新媒体艺术理论和网络文化研究，但并没有因此要求研究生都和我做同样的事情。相反，我希望并鼓励研究生将社会需要和个人兴趣结合起来，在学科互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通过教学相长，我见证了他们成长的过程，也分享了他们成功

的快乐。如今，我衷心祝愿显斌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也衷心祝愿读者能通过本书感受到湘西形象所带来的美感。

黄鸣奋

厦门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6年8月8日

前 言

湘西形象既包括中心文化圈民族对边地湘西的文化想象和“他者”表述，也包括湘西人的自我想象，前者叫做“镜像湘西”，后者称为“湘西自画像”，两者构成湘西形象的一体两面。镜像湘西重点研究注视者文化，该镜像由中心眼中的边地、礼邦眼中的蛮族、礼乐文明与现代文明眼中的巫楚形象组成；湘西自画像重点研究被注视者文化，该画像由边缘守望中心、民族重塑蛮族、圣地颠覆匪邦三个维面组成。镜像与自画像之间的互动构成湘西形象的生产与再生产，其生产逻辑是：在前现代，边地的参照系价值主要通过夷夏之间的想象实现；在现代，湘西的边地参考价值在文化共同体内外逐步被发现；在全球本土化的当下，湘西的参照系价值通过发明的方式来挖掘。湘西形象的生产与再生产研究将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渡入一国之内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对异地、异族形象的研究，是一国之内异地、异族形象研究的范型，是西方形象学理论的中国化。以湘西形象为研究方法既是解析中心文化圈边地观的重要渠道，也是建构湘西学的主导方法论和缘哲学的主要路径。在总体思路的指引下，本书分为七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由、选题意义，并对形象学研究以及湘西形象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在该部分中，对本书使用的主要概念进行拟定，并就研究的对象、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具体的说明。

第二章为“湘西观：中华文化圈中的形象生产场”。在本章中笔者从“缘网湘西”、“路径湘西”、“织品湘西”三小节探讨了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借鉴“场域”理论、“网络间性”理论、“五缘文化”理论，提出“缘网”为湘西混杂性文化体的起点，用三条“路径”为文化圈提供文化活力，用“织品”将人物、作品、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分呈现出来。

第三章为“湘西形象：形象生态的原型、类型”。本章从“原型：套话的‘套娃’结构”、“类型：边、蛮、巫”两节来论述。套话的套娃结构对形象学中的核心概念“套话”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将套话的结构运用在湘西形象的原型、类型与形象的生产与分配中。我们从地缘、亲缘、神缘的角度，归纳出“边”、“蛮”、“巫”作为主要套话。

第四章为“湘西形象：文学、影视、表演”，将湘西形象在文学、影视、表演中的生产与分配系统地展示出来。

第五章为“形象重塑：湘西人的自我想象”。本章讲述湘西人如何实现自身的“自画”能动性，通过边缘守望中心、民族颠覆蛮族、圣地改写匪土三种叙事模式，分别从地缘、亲缘、神缘实现边地的策略。

第六章为“文化逻辑：湘西形象的生产与再生产”，湘西形象在中心与边地之间的博弈，形象的类型在各个时期媒介中的再生产与分配，我们需要找到形象创生与变化的逻辑。

第七章为“结语：未来湘西形象——从边城走向世界”。我们在缘文化的框架下选取三组问题：第一组是地缘问题，在形象学中定位湘西是“边”，我们将观念引渡到现实，目前中国主推“一带一路”，以地理中的湘西为研究对象，思考基础设施建设在文化地理格局变迁中的作用。第二组是亲缘问题，在形象学中定位湘西是“蛮”族，我们将观念引渡到现实，研究湘西匪患的消除为当代的反恐提供的启示，“一带一路”的开拓为全球的反恐问题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第三组是神缘问题，在形象学中定位湘西是“巫”楚文化，我们将观念引渡到现实，湘西的地域文化在全球本土化语境中，是应致力于保持与强化区位特色，还是应致力于融入与同化，这为构建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借鉴。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价值	001
第二节 文献回顾	016
第三节 研究设计	021
第二章 湘西观：中华文化圈中的形象生产场	025
第一节 缘网湘西：从外在到在场	026
第二节 路径湘西：从器物到思想	050
第三节 织品湘西：形象场中的精神产品	072
第三章 湘西形象：形象生态的原型、类型	091
第一节 原型：套话的“套娃”结构	092
第二节 类型：边、蛮、巫	106
第四章 湘西形象：文学、影视、表演	123
第一节 文学湘西：从右洞庭到左沅澧	123
第二节 影像湘西：从精英到大众	152
第三节 表演湘西：从陈列到表演	169
第五章 形象重塑：湘西人的自我想象	203
第一节 “自画像”：边缘的中心守望	203
第二节 形象湘西的实践	215
第三节 湘西经验	223
第六章 文化逻辑：湘西形象的生产与再生产	239
第一节 权辨夷夏：想象湘西	240

第二节 礼求诸野：发现湘西	252
第三节 协和万邦：发明湘西	263
第七章 结语：未来湘西形象——从边城走向世界	307
第一节 边的机遇：“一带一路”中的开放湘西	309
第二节 “蛮”的转型：从他者到我们的兄弟	312
第三节 巫的升华：美美与共的湘西本位	316
参考文献	321
致谢：守望者说	333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价值

一、选题缘由

(一) 问题缘起

1. 两个基点

第一，在“多元一体”^①的中华文化格局中，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并非一个均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实体，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族群构成与组织结构各有不同，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千差万别的各个区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融会与分化而形成的一张“缘网”。湘西是该系统中的一个节点，从地缘的角度看，湘西处于地形阶梯的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被称为“内地的边缘”；从亲缘的角度看，湘西地区族群的身份经历了由“蛮族”到少数民族的转变；从神缘的角度看，湘西地区的巫傩文化可为“现代性”^②的启蒙叙

① “多元一体”格局出自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所做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报告。我们在此基础上，结合五缘文化、媒体间性、网络间性（黄鸣奋语）等概念提出“缘网”、“缘性空间”等概念。

② 关于现代性的概念：现代性结构呈现出一种张力结构，其一体两面是“历史现代性（亦称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庸俗现代性等）和审美现代性（亦称浪漫现代性、文化现代性、艺术现代性等）”。（俞兆平教授语）它们相互对抗，相互制衡。西方学者卡林内斯库在其《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对“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作了区分，他认为，科学精神和民主政治、艺术自由构成西方现代问题的孪生兄弟——现代性结构的正题和反题，一方面，历史现代性标榜的理性至上、科学万能、平等自由等思想原则，为功利主义、乐观主义、民主政治、科学化、市场化等社会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撑和思想武器，从而构成了现代结构的一维——历史现代性；另一方面，随着启蒙精神的张扬和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出现了理性桎梏、物欲私利的膨胀、道德沦丧、生态危机、人的神性诗意的失落，由此催生了对历史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有两条线，一是社会科学对现代性正面价值和启蒙信条的质疑；二是美学、文学艺术恪守的审美与艺术的自由自觉。反思和批判的落脚点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一方面人要把握外在世界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是实现自己的目的意图。参见俞兆平. 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俞兆平. 现代性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J]. 天津社会科学，2008（2）。

事提供另一种参考系。如果说潘光旦、费孝通先生是从历史学、民族学角度探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本书试着从观念史的角度再一次追问该格局的形成过程。

“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是从民族学与历史学的角度确证民族文化的自觉性，这一范畴的提出是对传统的天下观、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华夏文化观念、汉文化中心观念的否定之否定。传统对内外观念的确定、对中心与边缘的认定、对文明礼仪之邦与蛮族的确定，在现代性发生之后，中华文化版图的多元民族一觉自身为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内部又呈现出多元的特征，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间性”特征。这种差异性的特征在属性之间的差异之中得到体现，在现代性与全球观念未开始之前，这种内部的差异性被无限放大，从《史记》中记载的五服到《汉书》、《后汉书》中的蛮夷，再到《明史》与《清史稿》中的苗蛮，都是在内部共同中的差异性话语表述，自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圈的内部差异在对外的交流中意识到自身的共同性特征，这种共同性特征被烛照，差异性的特征退居幕后。从20世纪40年代凌纯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到潘光旦先生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湘西北新议“土家”与古代巴人》，到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再到中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明珂先生21世纪初写就的《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这一学术路线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学界为思考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多元差异与文化共同体自觉的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这种表述所产生的文化生产力不仅在学术界，更是在中华文化圈内部的国人身上产生了文化自觉，这一文化自觉不仅是中华地理版图的自我体认，更是属于中华文化圈的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实体与想象意识中的一体格局。这种多元一体格局话语是中华文化圈表述自身与对外交流的权利，这种权利能在现代性发生之后形成现代中国话语，这种表述能在全中国本土化时代构成从意识与实体领域构建自身的历史逻辑与身份确认。这种身份确认由两套坐标体系构成，一是从他者话语到自我话语的建构，这一话语体系是将西方的话语作为自身存在的坐标，中国形象也是作为他者参与到西方思考自身的资源与对象、作为镜像参与西方现代性发展的动力与资源；二是器物、制度、思想的话语递进观念。中国自近代以来，从器物的对外引进到制度的改革，再到中国思想的兴起，湘西形象的研究正是以此为背景开展研究，不追问有关湘西的表述与事实符合度的关系，而是追问在问题面前，表述者如何表述、为何表述以及表述的话语谱系是什么，对民族学、历史学领域产生的单元与一体的范畴，在形象学视域观照下产生新义，这是对传统湘西研究路径的否定之否定。

第二，在“全球本土化”^①的世界格局中，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新思考自身的国际地位。过去，在“先进的西方文明”的参照下，中国被列为落后的国际阵营中的“边缘”。如今，中国需要从学理上重新定义“先进”与“文明”、“后进”与“落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理念或为我们的民族文化争取话语权与生存空间，从而在多元的国际秩序中赢得自身文明的身份。传统社会中，过去被认为是落后的边缘文化在现代被认为是与中心相对的另一文明类型。传统社会中被置于教化地位的蛮夷（如“黔中蛮”）经过民族识别工作，从学理与历史文化的角度被确认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传统社会中被视为异者的巫傩文化信仰是“我们”（“我和你”）值得借鉴的生存方式与价值体系。如果说“全球本土化”概念是全球经济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和思潮，那么这种新的理论和思潮落实在湘西就是对湘西形象（中心想象边缘）、形象重塑（边缘守望中心）与实体湘西的互动研究。

“全球本土化”提出新的问题，引发新一轮的话语论争，全球化要求人们用全球观思考问题，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系列叙事，以西方的启蒙叙事对位东方的野蛮叙事，以西方的科技发展叙事对位东方的停滞叙事，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叙事对位东方的专制与独裁叙事，这种叙事是表述者的观念体现，这种观念能引发实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现实行为。二元对立的话语背后是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如果东方的野蛮叙事是落后的，西方的启蒙叙事是先进的，那么东方的野蛮叙事需要重新规训与塑造，而这种规训与塑造的推动者就是西方的表述者，而且这种新规则就由西方人设定。如果东方传统生产方式是停滞的，那么西方的现代科技就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从观念意识与实体行为确证现代科技的第一生产力地位。最能代表现代科技的就是以机器为代表的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技术带来的生产革命的发展。传统的农业、牧业代表着传统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要么被埋进历史的尘土，要么接受现代工作的规训，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之中，确立了现代优于传统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如果说西方民主制度建构代表人的“自我实现”，代表幸福与解放，那么与之相对的东方文明的专制与独裁就是落后的标志，落后的民族与实现民主制度

^① 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 由 globalization 和 localization 组合而成）的本义是指“全球化的思想，本土化的操作”（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的个人、团体、机构等。全球本土化不仅是一种营销策略，也是全球经济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和思潮。2002年11月26日，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Globality: A Mainly Western View”的演讲，使用“全球性”（Globality）和“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包容性术语来讨论社会和文化问题，这再一次包含了人类概念的丰富，并广泛和具体拓展了关于全球多样性的各种观点。转引自王宁：“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后现代、后殖民与新儒学重建[J]. 南京大学学报，2008（01）：71.

的西方构成二元对立，面对东方的国度与古代文明，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是充满优越感与憧憬感的社会制度。回溯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从器物、制度、思想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也是西方话语在后殖民社会的表述扩张，在西方的烛照下，东方是专制的国度、落后的蛮荒、专制的种族。特别是在全球本土化时代，西方的器物生产方式、制度治理范式、思想启蒙理想构成全球的普适性价值体系，东方国度的人们面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生产力以及观念扩散，要么被西方话语所主导，这种主导构成后殖民话语，要么封闭自我，固守自我的传统，实现重复式与循环式的文化生产。以萨义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东方学”的概念，话语表述的对象是东方，但话语背后的权利的主导者是西方，东方只是西方意识形态否定的对象，构成西方反思自身的乌托邦或者远逝的天堂。我们看到西方学者的勇气与信心，敢于反思自身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是一种内吞式的反思。处于东方的中国学者何以在全球本土化时代发出自我的声音，开拓世界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也是观念领域与文化实体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带来的是地缘政治构成的重塑式样。中国学者意识到自身身份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威胁到文化的存在感与虚无感，那么中国的话语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摆在我们的面前，思考的路径或许正在给人类带来积极性与踊跃性，或许是对人类发展的全方位否定，对人类的自信心给以痛击。中国话语需要在全全球本土化的话语中争取多元的声音，这种多元的声音是现实国际秩序与争取生产空间和生产资源的需要，那么话语与自我构成自身的出发点构成多元中的某一单位，单元之间是一种博弈与同构的关系，这种关系始终处于张力之中，这种张力的存在需要中国话语的逻辑论证。既然西方是一种话语，西方之外是另一种话语，那么这种话语的资源在哪里？一是与西方文化具有差异的他国文化，二是与西方文化具有差别性特征的本国文化。前者是非西方国家的共同路径，但这一路径都是在西方话语的内部开展，或者说这种讨论问题的前提是西方式的，这种问题的解答指向西方文化，甚至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完全是西方化的模式，名为反西方，实为受到西方话语的规训与“殖民”。后者是非西方国家自我话语的确证，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国度，这里从地缘的角度看具有多种差异的地理环境及其上的文化地理空间，从亲缘的角度看，这里有传统的礼乐文明与野蛮之邦，有现代的兄弟民族，这些兄弟民族共有英雄祖先，这种表述与建构为文化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性指明出路，或许未被现代化的生存环境能构成我们的“智慧腹地”；从神缘的角度看，文化信仰的差异性为多元世界的存在提供合法性证明，具有差异性的文化信仰或能为不同语境下的人们提供一种思想导向，在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或能生产自身的思想与智慧，因为“神”触及人的生存边界，这种边界之外非人的力量所及，这是人力所能主导与行使价值判断的领域；从物缘的角度看，传统物质的生

产方式或是对现代科技发展主义的全面否定与思考；从业缘的角度看，传统农业、牧业或许能在生态平衡的生存空间维持较稳定的状态，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与全球治理或许能在地方性知识中找到资源与动力。三是西方学界的自我反思，也是话语得以创新的动力，萨义德将西方的东方话语统称为东方学，东方是殖民的对象还是具有迷人色彩的乌托邦，这是对西方自身现代话语的镜像反思，是西方“思”的传统与现代传承。霍布斯鲍姆认为，“传统的发明”是对“发展的幻想”进行反思性批判，这是对现代话语发展的全面否定，也是现代话语实现自我更新的不绝动力。总之，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面对问题的思考是可靠而富有意义的，这种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正是思想可以产生的动力，仅仅实现自我循环的理论与研究或许只能成为摆设，超功利性的反思与批判或许是思想者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 四组问题

前面的两个基点提出文化观念与文化实体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对后者的认知，也是对后者的建构与扩展。观念的转变与使用不仅是对现实的真实符合问题的反映，更是表达主体的愿望，试图将观念化作现实的动力，将形象资源用以改变现实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提问：我们通过“谁”的眼睛“看”某一单元文化？这种“看”通过什么媒介加以“表述”？这种表述的观念体系是什么？这种观念体系背后的文化逻辑是什么？这种文化观念在现实的文化行为中如何生产与分配？在“和而不同”^①的主权国家与远近异国的相互承认和彼此制约的关系中，中华文化需要将边地、民族、信仰作为发展自身的文化资源。中华文化圈内的文化资源如何发掘，单位文化体采取何种策略面对全球本土化的趋势？“湘西”或许成为我们研究以上诸问题的范例，湘西形象不追问有关湘西的表述与湘西的现实之间的真实性或符合度的问题，重点研究中心文化圈的湘西观念，这种观念就是中华文化自我反思的一种路径，这一路径为中华文化在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实践中提供观念支撑，同时，湘西在面对“表述”的危机与困境时采取相应的策略以应对。

“湘西是什么”与“湘西为什么是”是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径，前者所进行的研究是将湘西物化为对象，这种对象是我们之外的某物，这种物的特征是固有的与客观的，对它的表述与论证永远处于是与非、真实与虚妄、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二元判断之中。物化的研究，研究的是物的特征，其富有冷冰冰的性质，对对象的宏观、中观、微观式的把握是我们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方式之间

^① “和而不同”出自汤一介《文化的多元共处——“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强调中国由传统意义上的华夏天下观思想到近代主权国家对远近异国的承认与彼此制约。

仅有差异性而不存在优劣之分，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式把握世界、实践式把握世界、宗教式把握世界、艺术式把握世界构成人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不管是何种把握世界的方式，都需要有“人”性，人的出现是人类存在感的体现。我们可以从研究湘西是什么的讨论转而开掘与追问谁的湘西、谁在表述湘西、表述的话语如何、为什么如此表述，这种追问正如美学领域的讨论，由对可观论美学到主观论美学的追问，这种追问厘清表述者与被表述者之间的关系，区别话语发出者与接收者。这一区别的重要性是表述的背后是表述者因为话语而出现文化行为，这种文化行为或是文化利益的分享抑或是生存资源的争夺，回归到人，或许是揭开症结的开始，因为湘西对谁重要、谁需要湘西才是问题可以揭开的提问方式，湘西进入谁的生活空间与生产资源领域是最为关键的，地缘政治的领域成为追问者背后的欲望与动力。对湘西表述者的研究不是追问正确的答案或者是寻求完美的生活结局，而是能为我们打开对人生、艺术甚至生存与死亡的理解，这种理解也仅仅是问题解答的一种，没有问题便没有思想产生，凭空产生的理论或思想仅作为自我复制与无意义的生产。纵观文化历史，作为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小单元，湘西不仅是一种地理式的存在，更是文化生活领域的存在，这种存在通过器物文本、制度文本、思想文本而得以存在。“思”是湘西存在的动力，那么谁在表述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的问题，因为只有找到表述者，才能找到表述的动力之源，对动力之源进行开掘，思想的源头活水方能汨汨流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几种表述者的话语决定了表述的基调：正史的“史学家”，称其为史学家仅仅从表述的频率以及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并非出于对其权威性的理解，不但不盲从权威，更要破除权威背后的虚妄话语运行体制；“二十五史”中的表述者最具影响力，史传是一种官方文化的集中体现，这种官方文化在多种情况下代表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领域决定社会的主流意识，从《史记》到《清史稿》共同构成历史文本中的湘西；与史传文化传统并行不悖的是非官方的精英意识系统，以历史文化名人的表述为依据，从战国时期的屈原到唐宋元明清的诗词歌赋戏都是构成文化表述的重要表述者；与外在表述相对的是本土的表述者或能提供另一种参照系，地方志书、生产生活的器物文本、制度文本以及思想智慧又是另一角度思考湘西本土的一种方式；还有“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流动的表述者，多重视角的表述正是构成“主体间性”表述的重要尺度，这种尺度的表述或能开启表述意义空间的可能，从他到我，从我与他到我、你、他，构成我们的意义空间，这种表述空间具有多个层面多个维面的层次，这种层次之间永远具有流动性与距离感。找到表述者之后是对表述内容形式的分析，内容的分析是从话语分析角度，从话语分析表述者的意识，语言是思维存在与运行的方式，语言存在于思维之中，思维又通过语言得以体现，语言是人得以实现世界秩序化的方

式,不管是理论方式、实践方式、艺术方式、宗教方式,语言都是人实现与物的交流,达到人与人沟通以及人实现与神的“神与物游”的重要方式,所以对语言的分析,就是我们找到研究的实际对象,福柯对“词与物”的解析就是我们理解话语、剖析话语、通过话语实现文化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对话语的分析不仅要进行“能指”与“所指”的辨析式理解,更需要对话语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进行解剖,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为我们理解话语的语境与动力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这种解释框架从理论上厘清了“我与他者”的关系,将“我对社会秩序”的态度充分呈现出来。是对社会秩序的肯定还是对社会秩序的否定通过话语的问题有无而实现,有问题是对社会秩序的质疑,这种质疑能为我们剖析表述者面对自身与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出现;没有问题表述者对秩序的皈依与顺从,这种态度又具有错位性与流动性。表述的大数据考察,从古今的视野与东西的视野中考察,一种话语可能反复被表述,这种表述的内容具有延续性,但表述之外的问题具有天壤之别,一种话语可能一鸣惊人但这一话语可能是对以往问题的创新性理解。对语言的语义层面的了解可以借助大数据思维得以体现,但对语言的寓意层面的了解需要剖析表述者背后的话语与论争,只有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对重要问题的工具性解读就能获得智慧型知识。为何表述,就是需要回到表述者的文化语境,表述的对象可能只是作为表述的导火线或者镜像理解,这种理解的关键需要表述对象的隐喻或者启发,这种隐喻与启发也可能遮蔽问题的显现,黑格尔提出的“感性理念的感性显现”与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是人与对象的关系问题,这种对象能否成为表述者的话语对象,或者这种对象能否直面问题的实现由表述者的话语策略决定。

3. 两条途径

第一是个案与范型,从影视、剧场表演到门类艺术群。本书研究的缘起是影视与演艺产业中兴起的湘西形象,研究湘西形象的第一步不是研究湘西文化而是研究表述者文化。这种形象不追问与湘西现实的真实与否或者是否符合的问题,侧重研究表述与塑造形象者表述了什么?为何表述?如何表述?这种观念表述对实体的影响如何等。在这一问题中,表述的话语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从传统到现代,我们从研究影视、剧场表演这两种话语类型扩展到历史、文学、电影、电视剧、剧场表演话语类型,从局限在影视、剧场两种表演媒介扩展到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新媒体等领域,也使得我们从传统的门类艺术研究进入艺术群体研究,从文艺研究进入文化研究。研究对象为我们提供了古今与中西的多维视野,在古今与中西的交织之中湘西具有了“混杂性”,从这种混杂的文化出发,我们从中清理出“缘”概念,从“缘”编织成网,然后从“缘网”的构架去为湘西形象提供合法性证明,这种证明是对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全新理解。

以专业的态度面对时代重大问题。开展中国问题的研究框架是古今视野与中西视野的结合，前者赋予历史的视野，后者注入全球的眼光，面对问题的出现，研究者应以专业面对时代重大问题，人文社会学者如何以专业应对时代重大问题，从问题出发，以专业的视角去面对。观念史的角度是从观念的角度介入时代重大问题，本尼迪格特特的“想象的共同体”是从观念的角度介入共同体、民族性形成可能是观念领域的重大推动。人是具有思维的智能型高等动物，思维中的意识与观念决定人的动作与行为的产生，我们在表述中国的时候，或者表述某一地域的时候，要怎么去发问与思考。例如，中国是什么有多种定义，可以从地缘、亲缘、神缘、物缘、业缘的角度去思考，这是从物化的角度去思考，如果从人化的角度去思考中国或者某一地域（如湘西），那么是谁的中国或湘西、谁表述中国或者湘西、他为什么要这么表述非常关键。是单一主体的表述还是多元主体的表述，表述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是达成共谋还是针锋相对，这种表述背后的权利双方的力量比例如何。回到湘西的问题，首先假定一个范围的表述者与这个范围之外的表述者是何种关系，这种关系对湘西的意义如何。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围绕表述者展开，那么展开研究的工作平台是什么，操作的界面是什么，我们可以依据马克思所提供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四种方式来确定，实践活动、理论思考、艺术想象以及宗教信仰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作业的平台，这四种方式之中，我们需要区分物质性、非物质性的维度以及器物、制度、思想的层面，从多角度的阐释进入研究领域。例如，历史文本就是中国的研究素材，艺术文本中的影视、戏剧、舞蹈、雕塑等众多门类艺术是想象力最为集中的体现，思想文本中的地方性系统知识以及宗教文本中的人与神的关系学说是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选取文本需要具有典型性，围绕精英文化选择文艺文本、围绕官方文化选择正史文本、围绕大众文化选择通俗文本都是区分素材的重要指标。区分文化使用主体不是文化研究的目的，研究的问题如果需要拥有广阔的视野与背景，就需要突破传统的专业界限，对这种界限的打破能够为学科赢得新的生命力，专业仅仅作为立足之点，出发点是发现问题可以开始的前提，前提的开启能够为研究做足充分的准备，专业的开启能够为问题的拓展提供工具与方法。正如，冰山型人格理论，专业只是浮在水面之上的冰川，如果要获取冰山的整体形貌，就需要展开更深层的研究与讨论，这种讨论正如需要突破界面进行探求。

学科发展的前提是对问题的解决，这种问题可以是人与物之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问题。针对这三种问题的研究与解惑会积累很多的经验与知识，积累的结果就形成积淀，这种积淀既可以是精华的提取也可以是简单的复制性陈列，这种积淀形成知识积累的形态，这种形态最高级的体现就是学科的诞生。学科的诞生是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结果，学科成为一种专业训练